

商代艺术风格中有关东夷文化因素的分析

楚小庆

(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 江苏南京 210005)

内容提要:东夷族曾广泛活动于我国东部地区。商与东夷族有过相当多的交流。商代璀璨的艺术成就渊源于史前时期就业已形成的艺术文化传统, 商代艺术风格中属于东夷艺术传统的占有相当的比重。这种艺术传统的继承当与商的族属有关。

关键词:商代艺术;东夷因素;兽面纹;鸟纹;陶器;玉器

中图分类号:J021

文献标识码:A

《礼记·王制》:“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1]“东夷”是我国古代对东方各族的泛称,其活动的范围主要在现今的河北省南部、山东省全境、河南省东部及江苏、安徽两省北部的广大地区^[2],甚至在东北与东南地区生活的部分原始族群亦可以归入东夷族的范畴。从新石器时代起,东夷族的先民们就生活在这一广泛的区域内,并缔造了光辉灿烂的史前文明。东夷族曾一度成为中原华夏族强大的竞争对手,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的进程中,一直扮演着异常重要的角色。史载商族早期曾活动于河南省东部、山东省西部和河北省南部一带^[3]。商族活动的这一区域,北、东、南为东夷文化区,西为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王朝的范围。

田野考古所见商代的青铜器、玉器、陶器等遗物,既是用于复原古代社会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亦是今人眼中珍贵的艺术品。研究商代艺术的来源以及其文化的构成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通过这项研究,我们可以了解从史前至商代艺术发展的纵向轨迹;另一方面,亦可从中获取商代艺术中的文化构成信息。商王朝所处的中原地区,虽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但商代的青铜器、玉器甚至陶器等,却并非完全继承自中原地区的史前艺术传统。正如王巍先生在探讨商代玉器的渊源时所指出的^[4],中原地区在史前时代的玉器并不发达,很难在这一地区找到商代玉器的渊源。但是,因为史前文化的多元性与多样性,商代艺术又并非是对史前艺术的全盘继承,即并非

所有的史前晚期艺术均为商代所继承。这种继承应当是有所选择的,而这种选择的深层次的原因应与商族的族属有关。商代艺术应有相当一部分因素来自于我国史前时代的东部地区。

目前在我国的东部地区发现了一系列的史前文化,主要有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江浙一带的河姆渡文化与良渚文化^[5]。这些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其发达的程度之高并不亚于同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的原始文明。商代制作的青铜器与玉器等艺术品,从形式上看大多继承了史前时期东夷族的艺术传统。以上的诸原始文化虽然在时间上与商代相去较远,但在史前时期,一种艺术传统往往可以流行于较长的时间及较广的范围内,因此我们还是能从商代的艺术中去探寻史前艺术的痕迹。

一 兽面纹系统

商代早期的青铜器不仅在器型上相对于夏代有所拓展,更为重要的是复杂纹饰的出现,其中以兽面纹最具代表性。兽面纹的形式一般为正面的怪兽形象,一对双目分陈于鼻脊的两侧,双耳与双角位于头顶,口位于鼻下,有时在兽面纹两侧还有长条状的躯干、肢爪和尾等。兽面纹最大的特点,就是对称位于鼻脊两侧的巨大双目,这一对目纹是兽面纹最为主要的构成要素。这种兽面纹究竟起于何时?考察一下史前东部地区的各原始文化便不难发现,在东夷族群活动的广大地区,从北到南,都盛行此种兽面纹的图式。

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出土了一批

收稿日期 2010-10-08

作者简介 楚小庆(1975~),男,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艺术学,文艺学。



图一// 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带齿兽面纹佩



图二// 山东临朐朱封龙山文化墓葬出土玉冠饰

重要的玉器,其中有一种器物为“带齿兽面纹佩”(图一),其整体为片状的横长器,器身上有呈对称分布的由卷勾组成的巨大“双目”,下部有并排的齿状物,器体两侧也有呈翻卷状的弯勾。众多学者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讨论,有人认为是早期形态的饕餮纹(此特指青铜器上的兽面纹)形象,并认为与后来殷周时期的兽面纹有渊源关系^[6]。东北地区晚于红山文化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曾出土了大量的彩绘陶,刘观民先生通过对彩绘陶的“纹式”的详细分析,指出了其与商周青铜器“纹式”的相似性^[7]。

在山东龙山文化出土的玉器上,也有兽面形象。1989年在山东临朐朱封龙山文化墓葬中出土了一件“玉冠饰”(图二),通长23厘米,由“首”、“柄”两部分组成,首部玉质乳白,通体透雕,柄部为竹节状,墨绿色玉质。杜金鹏先生认为这件玉器应当是插在冠或发上的礼仪性物品^[8]。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龙山文化的玉圭,其底部有刻划的兽面纹形象(图三),与临朐玉冠饰相似。这一兽面纹形象有一对同心圆的双目,头顶饰有用勾线

刻划的类似羽冠的装饰,眉宇之间有一菱形纹饰,狰狞而神秘。1982年在郑州二里岗发现的一件商代提梁卣上的兽面纹,其头顶有发达的冠饰,且眉间亦有一菱形纹饰,与临朐玉冠饰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玉圭的兽面形象极为相似。

相对而言,良渚文化的兽面纹与商代青铜器上的兽面纹关系最为密切,李学勤先生通过八个方面详尽的对比分析,指出“良渚玉器和商代青铜器的饕餮纹,固然不是彼此直接承袭的,但有很多共同的特点,不能用偶合来解释”^[9]。比如,1982年在江苏武进寺墩良渚文化墓地出土一玉琮(图四),在器身四隅共分布八个兽面纹形象,以器棱为鼻脊,左右并置重环的双眼,下部为凸起的嘴。这种将兽面的形象以器棱为中轴线,左右分布于器棱两侧的平面上的构图模式,亦被商代的青铜艺术所继承。1974年在河南郑州张寨南街出土的杜岭方鼎(图五),在器身的转角处,分别饰有兽面纹,且均以器棱为中线,凸起的圆眼对称平铺于左右,这种构图的模式可能受到良渚玉琮的影响。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我国东部沿海的广大地区存在着兽面纹的图案样式,这些兽面纹以玉器为载体,或与原始信仰有关。商掌握了青铜冶铸技艺后,久而久之就将这种兽面器纹样式移植到了青铜器之上。



图三// 台北故宫藏山东龙山文化玉圭上的兽面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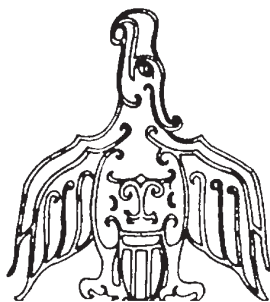
图四// 江苏武进寺墩出土良渚文化玉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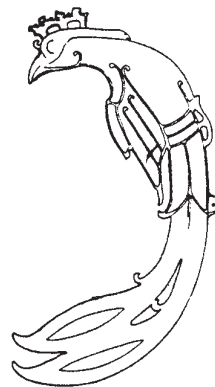
图五// 河南郑州张寨南街出土商早期杜岭方鼎

二 鸟形象系统

《诗·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娥氏之女，为帝誉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从记载可见商人将鸟奉为本族始祖。另外，于省吾、胡厚宣等学者通过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的研究，也指出商族的起源和鸟有关^[10]。商的族属与东夷至少有着一定关系，而在东夷文化区内，也有信仰鸟的传统，如东夷首领少皞就曾以鸟名官：“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左传·昭公十八年》）因此东夷也称为鸟夷。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普遍流行有关鸟的艺术品。巫鸿先生曾系统地论述了史前东夷地区的鸟形象，并谈到了部分鸟形象与商代鸟形象的渊源关系^[11]。山东地区有关鸟类题材的艺术品也以玉器为主，尤以龙山时代的鸟形器最为典型。前述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玉圭，其底部一面刻有兽面纹，另一面则刻有展翅欲飞的鹰鸟的形象，也以勾状的线条表现，引颈扬喙，姿态虽为站立却异常逼真生动（图六）。史前东夷地区的有关鸟类图像的作品，成为后世商代鸟形艺术的一个重要来源。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妇好墓玉凤（图七），俯首卷尾，头上饰有华冠，身上有刻划的勾状线条装饰。商代的青铜器艺术发展到殷墟阶段时，也开始出现了大量的鸟纹图像。这些鸟纹在最初常作为辅助纹饰出现在青铜器的颈部、肩部，鸟纹的头部大多饰有华冠，而且有些尾羽异常华美，鸟纹身上所装饰的线



图六// 台北故宫藏山东龙山文化的鸟形象



图七// 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凤

条，呈卷勾的形式。商代青铜艺术中的鸟纹，可能主要来源于史前时期东夷族的艺术传统，至少是在艺术题材上的继承，至于艺术样式方面，由于鸟纹是依附于青铜器之上，在继承其之前的艺术传统之后，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并且一直到西周时期，鸟纹依然是青铜器上的重要的纹饰之一。

三 余论

除兽面纹与鸟纹和东夷文化系统有关外，还有相当多的例证能够证明商代艺术与史前东部地区的密切关系。

商代部分青铜器在造型上是源自东夷艺术传统的。使用青铜材料制作的青铜礼器，其在造型上最初无一例外地模仿了陶器的成熟造型。《西清古鉴》中曾著录过一件铜鬶（原书称“周子孙匜”），其器形便是模仿了山东地区从大汶口到龙山时代的陶鬶的造型，有学者提出此件铜器当为“东夷”文化系统的礼器^[12]。商代的青铜甗与觚这两种容器，也应属于东夷文化系统。在山东龙山文化中陶甗是常见的器类，商代的青铜甗与山东龙山文化的陶甗在造型上非常接近，青铜觚的造型则可能来

源于从大汶口到龙山时期一直流行的一种黑陶杯。商代晚期出现了一大批仿生的器物造型,这些器物所表现的动物形象,有相当一部分即为东部地区常见的装饰题材,比如现分藏于上海博物馆和湖南省博物馆的两件“豕尊”,在造型上就与山东地区出土的陶质猪形器相似,可能也是东夷传统的延续。因为猪在山东地区的大汶口至龙山文化时代就被视为财富的象征,所以模拟猪的艺术品在东部地区也较多见。

商代的玉龙也渊源于东夷艺术传统。商代的玉龙多为蜷体的形状,首尾呼应。具备这一形制特点的玉龙最早出现于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又以内蒙古赤峰出土的C形玉龙以及辽宁建平牛河梁采集的玉猪龙最为著名。玉龙的这一形制早在史前时代晚期曾影响到山东的龙山文化、江淮地区的凌家滩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以及东南地区的良渚文化,并最终为后世的商文化所继承、发展。有学者也早已指出过这种继承的关系^[13]。

商代艺术相对于其之前的新石器时代,达到了历史上的新高度,尤其是璀璨的青铜器与玉器艺术更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这一成就当归功于史前时期便已积累起来的艺术传统。商代的各艺术门类应当有着更为广阔的渊源与传统,但由于商与东夷族之间的密切交流,因而商代艺术中有相当一部分被打上了东夷族的烙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普遍流行兽面纹的图式结构,这种图案格式被商代青铜器艺术所继承,并进而成为商代青铜艺术中最为重要的纹饰之一。东夷地区盛行的鸟崇拜的信仰和与之相关的艺术形象,亦被商代的青铜器、玉器艺术所继承。商代部分青铜器的造型,也与东夷地区的陶器有关;商代的玉龙和龟形艺术品等,均能在史前的东部地区找到确切的渊源。因此,可以认为:

史前东部地区形成的深厚的艺术传统是商代艺术风格形成的一个重要文化来源。

- [1]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1338页。
- [2]李德山:《东北古民族与东夷渊源关系考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页。
- [3]袁行霈、严文明等:《中华文明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9页。
- [4]王巍:《商文化玉器渊源探索》,《考古》1989年第9期。
- [5]红山文化的年代数据来源于赵宾福:《红山文化研究历程及相关问题再认识》,《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其他数据来源于:张之恒:《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46、155、209~211、232页。
- [6]李缙云、刘淑娟、吕军等均认为与饕餮纹有关。见李缙云:《谈红山文化饕餮纹玉佩饰》,《中国文物报》1993年4月25日第3版;刘淑娟:《红山文化玉器类型研究》,《辽海文物学刊》1995年第1期;吕军、栾兆鹏:《关于红山文化勾云形类玉器研究的几个问题》,《文物春秋》2001年第1期。
- [7]刘观民:《中国青铜时代早期彩绘纹饰试析》,《考古》1996年第8期。
- [8]杜金鹏:《论临朐朱封龙山文化玉冠饰及相关问题》,《考古》1994年第1期。
- [9]李学勤:《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
- [10]于省吾:《略论图腾与宗教起源和夏商图腾》,《历史研究》1959年第1期;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痕迹》,《历史论丛》1964年第1期;胡厚宣:《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的新证据》,《文物》1977年第2期。
- [11]巫鸿著、郑岩等译:《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三联书店2005年,第11~28页。
- [12]邵望平:《铜鬻的启示》,《文物》1980年第2期。
- [13]孙机:《蜷体玉龙》,《文物》2001年第3期。

Dongyi Cultural Factors in Shang Dynasty Art

CHU Xiao-qing

(Institute of Culture and Art of Jiangsu Province, Nanjing, Jiangsu 210005)

Abstract: Shang ever had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Dongyi clans which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eastern region of ancient China. The artistic achievements of the Shang Dynasty were originated from the tradition which could be dated back to the prehistoric times, while quite a few of the Shang art styles from the traditional arts of Dongyi. Such inheritance was related with the clan attributes of Shang.

Key words: Shang Dynasty art; Dongyi factors; animal mask pattern; birds image; earthen ware; jade ware